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孔孟语用学思想研究

Kongmeng Yuyongxue Sixiang Yanjiu

施麟麒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孔孟语用学思想研究

Kongmeng Yuyongxue Sixiang Yanjiu

施麟麒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孟语用学思想研究/施麟麒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6
(2018. 11 重印)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ISBN 978-7-5203-2846-3

I. ①孔… II. ①施… III. ①孔丘(前 551—前 479)—哲学思想—研究
②孟轲(前 390—前 305)—哲学思想—研究③语用学—研究 IV. ①B222②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096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麟麒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孔孟语用学思想研究》即将出版，该书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作为导师，首先向他表示祝贺。

语用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传入我国，学科发展迅速，实际应用广泛，显现了蓬勃生机。惜乎其“舶来品”的帽子也为中国语言学界增加了一丝尴尬。近年来国家倡导“文化自信”，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创造有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摆脱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局面，转而能与之平等对话。我对此深表赞同。

学术创新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先要“照着讲”，然后“接着讲”。中国古代虽无“语用学”这一学科和提法，对语用问题却有不少真知灼见，这些思想大都简素朴实，不够系统，但确是值得后辈开掘的宝藏，只可惜未引起足够重视。据我所知，陈宗明先生主编的《中国语用学思想》仍是至今国内唯一对传统语用思想进行综合整理的专著。

本人也很早产生了从传统文化典籍中寻找语用学思想资源的想法，并指导几位研究生做了相关研究。麟麒的博士论文基本符合我的期待，修改成书后，优点更加明显。主要体现在：对西方语用学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指明其利弊得失；搜集了大量直接或间接反映孔孟语用思想的文献材料，加以合理的分类、系统的概括；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和西方语用学理论进行了初步比照。本书还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新见，如中国语用观念更重人格，与“德行”紧密结合，又如对孔子的“正名”说、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说都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体现出作者锐意创新的精神。

本书也还存有一些遗憾，如对先秦儒家只谈及孔孟，对同为大儒的荀子未有论及；先秦儒家与诸子语用思想的联系与差异，也未展开；至于后

儒（如汉儒、宋明理学家、新儒家）对先秦儒家语用思想的发展，更可以深加探讨。所幸作者年富力强，相信将来会再接再厉，带给我们更多相关成果。

此外，本书因出版要求，仿《中国语用学思想》定名为《孔孟语用学思想研究》，学科归属似更明确，但内容实为儒家圣贤的语用思想研究。在对象和内容上还带有前学科性，“语用学思想”与“语用思想”，一字之异，意义微殊，似可一辨。

是为序。

王建华

2018年5月18日

于杭州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一 研究范式的反思	(1)
二 研究范围的框定	(4)
第二节 研究对象	(6)
一 语用思想	(6)
二 儒家的立场或视角	(6)
三 儒家语用思想	(7)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选题意义	(8)
一 研究目的	(8)
二 选题意义	(9)
第四节 理论基础	(10)
一 阐释框架	(10)
二 阐释视角	(20)
第五节 材料方法	(20)
一 研究材料	(20)
二 研究方法	(21)
第二章 研究回顾	(24)
第一节 西方语用学发展路线	(24)
一 从单元论到综观论	(24)
二 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	(26)
三 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	(27)
第二节 国内语用学研究概览	(28)
一 理论引介、批判和重构	(28)
二 理论运用和现象解释	(30)

三 传统语用思想梳理	(32)
四 孔孟语用思想梳理	(34)
第三节 小结	(38)
第三章 孔子语用思想(上)	(41)
第一节 孔子其人	(41)
第二节 思想背景	(41)
一 传统沉积	(41)
二 时代需求	(42)
第三节 语用主体	(45)
一 君子及其内涵转变	(45)
二 君子人格	(47)
第四节 君子和语言使用	(52)
一 君子重“言”	(52)
二 “言”的语用性质	(53)
三 言人关系	(54)
四 诸德与“言”	(61)
第四章 孔子语用思想(下)	(86)
第一节 用言之方	(86)
一 取譬	(86)
二 “正名”	(97)
三 “时然后言”	(104)
第二节 理解之道	(115)
一 理解的基础	(115)
二 理解的目 的	(116)
三 理解的层次	(116)
四 理解的方法	(118)
第三节 孔子语用思想小结	(124)
第五章 孟子语用思想(上)	(127)
第一节 其人其书	(127)
第二节 思想背景	(128)
一 传统文化与教育背景	(128)
二 加剧的意识形态危机	(128)
三 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	(129)

四 儒门内部的分化	(130)
第三节 语用主体	(132)
一 心性论	(132)
二 养气论	(135)
三 理想人格——“大丈夫”	(138)
四 “大丈夫”与君子的比较	(140)
第四节 “大丈夫”与语言使用	(141)
一 大丈夫重“言”	(141)
二 言人关系	(143)
三 诸德与“言”	(145)
第六章 孟子语用思想（下）	(154)
第一节 用言之方	(154)
一 “强恕而行”	(154)
二 正人心	(164)
三 顺时而权	(164)
第二节 理解之道	(170)
一 “以意逆志”	(170)
二 “论世”	(182)
三 “以意逆志”和“论世”作为理解方法的结合 及其适用范围	(190)
第三节 孟子语用思想小结	(198)
第七章 结语	(201)
第一节 孔孟语用思想回顾——兼与西方语用学比较	(201)
一 语用主体	(201)
二 言语功能（语用意义）	(203)
三 表达和理解方法	(207)
第二节 孔孟语用思想对语用学发展的启示	(211)
第三节 有待讨论的问题	(213)
主要参考文献	(215)
后记	(227)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 研究范式的反思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运用及其规律的学科。它诞生于现代西方，自 20 世纪 70 年代建立以来，以迅猛的速度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预设到言语行为理论，从会话含义理论到礼貌原则，从新格赖斯原则到语言综观论、博弈论，理论不断推陈出新，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其研究内容包括：从说写者和听读者的不同角度以及相互关系上，研究人们的语用行为（语言表达和理解）；研究特定语境的特定话语，并探求语境的种种功能；研究话语的种种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及其相应条件；等等。我国的语用学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经历了从语用学理论的引介到结合汉语实际开展汉语语用学理论和应用的过程，30 年来同样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相关著作和论文的大量涌现，语用学作为新兴学科也日益成为中国语言学界引人注目的“显学”（王建华，2009：305—328）。

不过，相比西方语用学领域日新月异的理论研究，国内语用学的研究范式却较为单一，即侧重于对西方语用学理论的引进、验证修补和应用（钱冠连，1997：15）。这一范式会给汉语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发现，也有利于西方语用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如果只进行一维度的工作，而忽视相对独立的、植根于本土的理论开发（钱冠连，1990：237—257），也会产生弊端。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研究范式使普通语用学——以研究人类一般语言使用现象为任务的科学，和西方语用学几乎成了同义词。而西

方语用学的理论几乎都是以英语为对象而建立的。即便在后期的验证过程中发现了其他语言的不同语用特征,也只是将其视作某种特定条件下的变体,无损于原有理论的基本格局。这种情况很像韩礼德(Halliday, 2006: 12)批评哲学语言学时所說的:“现代哲学语言学是以人种论为中心的,这一点令人苦恼。它把所有语言看成是英语的特殊变体。”

语言使用是高度复杂的人类行为现象,语用学研究是盲人摸象,没有哪一种理论敢保证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而仅靠西方语用学家生产的某几种理论显然难以解决所有问题。中国学者寻求更多的理论范式能为语用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动力,有助于解决更多的问题。何况语用学的发展历史不长,至今连学科的定义都未能统一(参见列文森,1983: 6—27;梅,2001: 6)。梅(2001: 6)就说:“如何进行语用学研究,语用学应该研究什么,如何定义语用学是什么不是什么,就连语用学研究者之间也缺乏共识。”这也暴露了这门学科的不成熟性。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国学者应当具有对人类一般语用现象提出自己见解乃至完整理论的权利、责任和气魄,而不能满足于对西方语用学理论的亦步亦趋。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追求人类大同的理想。而大同乃是“和而不同”,绝非一家独大(庞朴,1997: 1)。在对人类一般语用现象规律的探索过程中,也只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主体相互对话后才能形成最大的共识和了解彼此的差异。由是观之,对语用学进行相对独立的理论探索,有利于消除不利于“大同”的因素:谨防语用学变成西方的“一言堂”,营造语用学多元对话的氛围,在平等、理性的双向阐发中寻求共鸣和发现自身。

但是,“假如遗忘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是从外来理论中讨生活,即使是理论天才,也无法取得创造性成果。离开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任何学术研究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李清良,2001: 14)。语用学的理论大厦也并非建立在一片荒漠之上,而是要扎根于传统哲学、文化的厚实土壤。从已有的理论来看,西方语用学主要是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脱胎而来。而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中同样包含丰富的相关资源。尽管语用学的界定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我们不妨回到莫里斯(Morris, 1938: 30)对语用学所做的原初定义上:

语用学是研究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的科学。……由于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符号的解释者都是生物体,因而对语用学的一个足

够准确的定性就是，它研究符号的生物学特征，即符号产生功能中出现的心理现象、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

简言之，语用学就是研究语言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之间的联系。按照这样的定义，是没有理由不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语言使用和人关系的思想纳入语用学研究的版图中的。

事实上已有学者持有这样的看法。如姜望琪（2003：1）就认为“语用学是研究‘言外之意’的学科。而‘言外之意’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最早研究语用学的国家”。而美国学者陈汉森（1998：71—72）更是多次提到类似观点：

已经证明，以语言为中心的观点特别适于用来解释中国哲学理论。要想在中国思想中找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明显的相应理论，众所周知这是很难的。不过，整个古典时期却以其有关语言和它的语义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语用（语言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显露出一種魅力。

把语言分成语形（语言实体的相互关系）、语义（语言和语言之外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和语用（语言跟语言使用者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三部分，我们就可以认为中国思想集中于语用的研究。因此比较而言，中国思想较少关注语义上的真假，而较多地关心语用上的可接受性。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语言在某个基本方面是不同的，使判别真假的准则不能适用——对他们的语言是能适用的。不过，在他们自己陈述哲学问题和处理争端时，表达恰当性或“可接受性”（“可”）的广泛语用检验，比类似语义真假概念的任一种观念较常受到注意。因而中国哲学家不问哲学断言是否为真，而代之以问它是否可断定，即“可”。

如果我们认为道就是一种行为之道（way），那么名称、区别和评价的全部就相应于一个道。一个道是相应于一个话语系统的具体行为集——它的行为的体现（对儒家而言是人的社会行为，对道家来说是所有事物的自然“行为”。这显然是用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来理解儒家和道家的“道”。——笔者注）

一位西方学者在探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语言和逻辑问题时，居然

也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语用学特色，这无疑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另外，我国学者陈宗明（1997）《中国语用学思想》一书不仅认定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包含着语用思想，而且已经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了大量宝贵的整理工作。尽管内容还稍显零散单薄，但已为我们更深入地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只要有语言表达和理解行为的发生，就有关于这种行为的理论，尽管其理论形态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面貌。而在中国卷帙浩繁的经典中蕴藏的有关中国文化对语用问题的阐发和思索，不仅可能发现与西方相通的见解，更有可能发现超越西方的见解，从而成为现代语用学理论发展的理论资源，其研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二 研究范围的框定

如上所说，以中华民族主体的身份，进行语用学理论的探索，是一项极富重要意义的工作。而唯有接续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语用学理论，才能为语用学研究展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眼光。因此我们的研究将从整理传统文化的语用思想资源起步。

面对丰富的传统资源，该如何着手？我们很自然地首先将目光投向儒家。儒家是对中国文化最有影响并且自成体系的思想流派，其学说中留存着大量有关语用的真知灼见。这一点，无论是从孔门四科包含“言语”，孟子的自称“知言”，都可以证明。而且儒家思想几乎渗透在一切传统学术当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灵魂和外在的言说模式。因此研究儒家的语用思想，能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

不过，儒家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若干阶段和支脉。如果不分先后主次地统而论之，一则可能会掩盖本真、核心的精神，二则也是一部书稿难以完成的任务。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次缩小范围，首先把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家作为研究对象。先秦，主要指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这一时期，隶属于人类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即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988: 68）所说的“轴心时代”：

发生在公元前八百至两百年间的这种精神的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年代，才形成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为“轴心时代”吧……中国出现了孔子

与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

近人康有为（刘梦溪，1996：350）则称这一时期为“诸子并起创教”的时代：

……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故大地民众，皆蓝萌于夏禹之时。积人积智，二千年而事理咸备。于是才智之尤秀杰者，蜂出挺立，不可遏靡，各因其受天之质，生人之遇，树论语，聚徒众，改制立度，思易天下。惟其质毗于阴阳，故其说亦多偏蔽，各明一义，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然皆坚苦独行之力，精深奥玮之论，毅然自行其志，思立教以范围天下者也。外国诸教，亦不能外是矣。当是时，印度则有佛、婆罗门及九十六外道，并创术学；波斯则有祚乐阿士对，创开新教；泰西则希腊文教极盛，彼国号称同时七贤并出，而索格底集其成。故大地诸教之出，尤盛于春秋、战国时哉！

可见，人类各大主要文明，无不诞生于这一时期，儒家文明亦不例外。雅斯贝尔斯认为今天意义上的“人”是在这段时间所形成和发现的。这对于语用思想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观点。以此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是无可争议的不二选择。

而之所以选择孔孟二圣，则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先秦儒学的最高水平，是超越文化时空的思想巨擘。^①正是他们把儒学提升为显学，使其在整个

^① 孔孟在儒家思想史上的正统地位毋庸置疑，但这里还需要对荀子作一说明。荀子虽也被许多人称为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但从儒学史的角度来看，对其评价争议较大。（唐）韩愈认为孟子之学“醇乎醇者”，荀子之学“大醇而小疵”（《读荀子》），“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且并没有把荀子看作儒家道统的继承者。（宋）二程又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二程遗书》卷十九）。朱熹注《四书》，则更是将荀子排除在了正统儒学之外。（清）谭嗣同云“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二十九》），梁启超云“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学之大不幸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足见对荀子的贬抑之剧烈。加上荀子又培养了李斯、韩非这样的法家门徒，其儒家思想的纯正性遭到质疑也是自然而然的了。相比之下，孟子则似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因此，尽管我们未必认同上述对于荀子的负面评论，但本着谨慎的原则，本书暂不把荀子作为研究对象，而选择将来另文讨论荀子的语用思想。

中华文明历史上长期处于轴心的地位。

第二节 研究对象

一 语用思想

在讨论研究对象之前，我们需要将“语用”“语用思想”“语用学”三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语用即语言使用的事实，是一种有待认识的现象，语用思想是对这种现象的认识成果，而语用学则意味着进一步将认识系统化、学科化、专门化。后者包含了前两个因素，但同时具有理论和方法的自觉意识。孔孟虽然没有语用学的自觉，但并不缺乏语用思想。本书的研究对象便是孔孟的语用思想。

另需说明的是，语用思想应具备语用学的一些基本要素，比如话语/言语行为、语用意义、语用主体、语用原则/准则/策略、语境等等（王建华，2009：305—328）。这些基本要素都存在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广阔空间。但我们认为它们作为语用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只不过每一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和内部地位可因不同理论而有所差别。而正是这些不同，才体现了不同理论的特色。

正如陈宗明（1997：11）所说：“人们只要围绕言语交际，研究语境、意义及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话语的表达与理解以及相关问题，与此有关的理论或观念，我们都可以看成是语用学思想。”孔孟当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以上这些语用学术语并给予专门讨论，但其思想体系中已经涵括了这些术语指代的实质内容，因此借助这些基本术语来进行阐释，至少是比较方便的。

二 儒家的立场或视角

要把握孔孟开创的儒家语用思想的准确切入点，我们最好首先确定其根本的哲学立场。因为哲学立场是一切认识和行动的根基。

儒学是一种伦理本位的学说。它最大的特色是“将自然和人生的一切现象都赋予道德化的理解。在儒家看来，天地宇宙本身即含有价值，也即德性，而人是天地所生，因此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实践，使天德下贯为人德，人德上齐于天德，且归于天人同德”（张岱年、方克立，2004：

254)。这种伦理本位的观点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比如：

蔡元培认为：“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而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哲学、心理学，本与伦理有密切之关系。我国学者仅以是为伦理学之前提。其他曰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挹坚甲利兵，是军学范围于伦理也；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我国伦理学之范围，其广如此，则伦理学宜若为我国惟一发达之学术矣……”^①

梁漱溟从儒家视角出发，用“伦理本位”的概念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厚。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②

张岱年也作了类似的表述：“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哲学，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则往往与伦理学相融，主要是一种道德哲学。这一点在儒学中体现得尤为鲜明。”^③

由上述各位大家的共识中不难窥见，儒学实可看作一种伦理学说，但它不同于现代作为学科分支的伦理学，而是作为诸多传统学术的母体，因而可以看作伦理主义哲学。

三 儒家语用思想

正如梅（《语用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 页）所说：“要发现语言的功用，你必须找到使用者，以及是什么令他或她说话。”

基于儒家伦理本位的学说特色，直接导致其将人作伦理主体或道德主体的认定。因此也不难理解，儒家的语用思想，主要是围绕着语言使用中

①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 页。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 页。

③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4—267 页。

的伦理道德问题展开的。在儒家看来,语言这个工具,是为了实现人的道德目的而存在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或至少没有更重要的目的。如果语用学是把语用意义作为核心论题的话,那么儒家眼中的语用意义,也就是语用道德。换句话说,儒家关注的是语言使用的善与恶,着眼的是语言使用的价值问题。

语言使用中的伦理道德在西方语用学中也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比如英美分析学派^①所提出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是否具有伦理意义一直颇受争议。欧陆学派则赋予了语用道德更为突出的地位。比如哈贝马斯(Habermas)创立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将真实(Truth)、正确(Rightness)、真诚(Sincerity)(或者说真、善、美)作为理想交往行为的三个必备条件,并将“合法的人际关系”(Legitimat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置于其语用学的中心地位,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扭曲的交往行为进行批判,这使他的理论带有更强的伦理学色彩(Jürgen Habermas, 1998: 54-56)。而以批评话语分析(CDA)为代表的批评语用学(Critical pragmatics)则旨在“帮助语言使用者意识到自身所处的语言权力制度状况,并揭露甚至在需要时反抗这种权力制度,以促进自由和独立”(梅, 2001: 320)。这种研究同样具有道德色彩。

尽管如此,西方语用学并未将伦理道德视作讨论言人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因而不同于儒家的视角。将伦理主体对道德目的的实现置于一切语用问题的中心,这可以看作一种儒家语用思想的基调。而这一基调,正是由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所共同奠定的。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选题意义

一 研究目的

本书以西方语用学的主要问题为参照,旨在通过研究孔孟,梳理、阐

^① 西方语用学发展至今形成了英美分析学派与欧洲大陆学派两系。前者将语用学看作和语言学各个分支并列的子学科,着眼于微观研究,把意图的推理作为核心问题,致力于指示语、言语行为、会话含义理论、预设以及会话结构等基本分析单元的研究;后者强调从社会、文化、认知等多个角度对语用现象进行宏观、综合的研究,反对把语用学看作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反对把意图推理看作语用意义研究的全部。

发、重构其语用思想，勾勒孔孟语用思想的整体面貌，在尽量还原其本真精神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现代学术话语的转换。为此，本书设定以下五个面向孔孟的问题，以帮助实现研究目的：

1. 如何看待作为语用主体的“人”？
2. 如何看待人（德）言关系和言的性质、功能？
3. 如何在话语表达中结合语境履行道德，生成意义？
4. 如何在话语理解中结合语境体现道德，生成意义？
5. 孔孟语用思想和西方语用学的主要理论相比有哪些相通之处和独特性？

二 选题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多次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并认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因此要通过各种形式“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进一步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意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从整体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具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面对这一重大时代需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肩负起重要使命。习近平在2016年5月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等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